

三个影子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斯特列利尼科夫和拉拉

张晓东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主人公, 尤里·日瓦戈、斯特列利尼科夫和拉拉在 20 世纪俄语文学中是谜一般的形象。作者并未在外部细节给我们画出他们的轮廓, 而是对于他们的精神世界倾注了大量的笔墨。他们仿佛作者生命的倒影, 为作者表达出自己对历史, 对历史中人的“生”, 对福音书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 偶然性; 历史理性主义; 神秘主义

中图分类号: H042

文献标识码: A

在自己的自传体随笔中, 帕斯捷尔纳克将马雅可夫斯基等 3 个诗人称作自己的“三个影子”。影子, 有光的时候, 总是紧紧跟随着我们。我们并不因此愉快, 有时候甚至不喜欢他们, 因为有时候他们让我们从自己身上看出那些阴暗的角落来。从他们的身上, 我们时常可以拷问我们的灵魂深处。对于一个具有普世情怀的作家, 像帕斯捷尔纳克, 更是容易从这些“影子”身上找到那内心深处的洁白来。“诗人之死”给同样是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一种震撼: 他甚至不能和自己的影子对话了。他为此甚至感到愧疚, 感到自己欠了一笔沉甸甸的债。

作为“还债”, 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转向散文的写作, 其间或许有些可以被人所诟病之处, 但是他无疑还是通过可以常留在文学史上的文学形象, 道出了自己最想说的话。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 有 3 个主人公: 尤里·日瓦戈, 斯特列利尼科夫, 以及拉拉。帕斯捷尔纳克赋予他们以生命, 或者还可以说, 他们自己从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活了起来, 和帕斯捷尔纳克对话, 甚至争辩, 他们同样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三个影子”。他们仿佛是帕斯捷尔纳克生命的倒映。利哈乔夫说, 《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自传”。在主人公的身上寄托着帕斯捷尔纳克孤独的精神探求; 在他们身上, 我们听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对历史, 对必然性, 对福音书的独特思考。在这场充满危险的思考中, 我们看到德国哲学对于他的深刻影响, 看到他对于 19 世纪以来各种革命的反思, 看到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所赋予他的灵感。这在他的主人公身上突出表现为, 个体的生命只不过是一场偶然性的事件, 而“历史的目的”, “历史的命运”, 被他打上了重重的问号。

1 尤里·日瓦戈: 医生、诗人、神秘主义者

日瓦戈医生的命运中充满了各种“偶然性”。他说: **“我只想弄清楚事实, 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 他的命运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偶然性”, 充满着各种反常规的事件, 在他生活的时代, 他是一个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异端, 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

尤里·日瓦戈表面上看起来孤僻, 古怪, 远离人群, 更是个远离政治生活的人。不仅如此, 他后来好像对什么都不热心, 甚至是对自己的行医生涯, 对自己办护照去看望前妻和儿

子也都不积极。联系他在这个“如火如荼的新时代”的表现，有的研究者认为，小说是“唱给旧时代的一曲挽歌”，日瓦戈医生“落后于时代”。在苏维埃式的评论中，乌尔诺夫的看法比较具有代表性，他的文章可以说是反对日瓦戈医生这个“多余人”之集大成，他甚至认为日瓦戈医生是一个克里姆·萨姆金式的“多余人”，灵魂空虚，二流诗人，思想平庸，萎靡不振，等等。（《真理报》，1988 / 04 / 27）简直就是垃圾，“人民”的“寄生虫”。或许还像保尔·柯察金说冬妮亚的那样“酸臭”。卡切夫也认为，日瓦戈医生违心地生活着，就像契诃夫的那些医生的形象一样。在感叹，在抱怨，可是不敢采取任何行动，也不敢承认现实，不能汇入**历史的洪流**中。

无论是卡切夫还是乌尔诺夫，还是其他持这种意见的人，他们没有说出来，或是不愿说出来的一点是，日瓦戈医生对“**历史的洪流**”恰恰有着很深的怀疑。我们认为，他的意义就是在于以自己的个体生命的**偶在性**去反对“历史的洪流”的**必然性**。对日瓦戈医生的理解不能在日常俗世生活的层面进行。在一个日常的、普遍的、以“一般”和“大多数”、“必然性”为准则的世界里，所谓的**力量**往往都不是精神意义上的力量，警察和军官，银行家和商人往往比诗人和哲学家、先知和圣徒更有力量。如果要在俗世世界里来衡量日瓦戈医生的价值，就像要质问为什么耶稣不和法利赛人握手言欢，苏格拉底为什么不去为自己洗刷清白，可是耶稣选择了被钉上十字架，苏格拉底饮鸩而亡。他们在物质的世界里都不是胜利者。如果说日瓦戈医生不去“老老实实地行医”，这是因为他的诊断手段被视为**异端**才不能够行医的。他看病依靠自己的直觉，这也是常理所无法接受的事件。日瓦戈医生一生都在对他的时代进行着精神探索，在精神上，在这种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最积极的活动上，他完全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们不必从小说中寻找日瓦戈医生在进行创作时的狂喜，也不必细述他的思想成为很多人的精神支柱，在这方面，在思想的力量上他在他的时代是个强有力的人。

尤里·日瓦戈是一个医生，但他不仅是一个医生，帕斯捷尔纳克试图让他的心里怀着一种基督式的悲悯，要来救治这个脱了节的时代。当然，其中包含着帕斯捷尔纳克对耶稣基督的艺术家式的理解。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日瓦戈医生对于耶稣基督的效仿，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效仿。日瓦戈医生把精神上效仿耶稣基督看作自己的职责，但他往往在这个职责面前感到力不从心，因为这很痛苦，就如同在漫漫长夜中苦守神性的诗人，往往会遭到被放逐，被摧残的厄运。就如同耶稣一样，在这种职责面前尤里·日瓦戈会有动摇，他把这种动摇看作自己的**意志薄弱**。事实上也就是日瓦戈的《哈姆雷特》中写的，“假如天上的父还肯宽容，请从我身边免去这苦酒一尊”（Если только можно , Авва Отче , Чашу эту мимо пронеси.）。但是还包含着一句潜台词，“要按照你的意思，而不是我的意思做”。从这一点看起来，他虽然有这样的动摇，但是仍然挺身而出，去肩负起黑暗的闸门。在那个时代，缺乏的不是随声附和的大多数，相反，缺少的正是这种独立思考，穿行于黑暗的密林中的人。“投身于火热的时代”，这是一句有相当煽动性的话语。投身于中并非难事，但是在一种狂热的如同献祭般的活动中，如何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独立思考？他是医术高明的医生、满怀激情的诗人、思想驰骋天地间的神秘主义思想者。

医生是他的职业，这个职业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并没有当过医生，在小说中也很少有对日瓦戈医生行医的专业描述，但是小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公认的“天才的诊断医师”（帕斯捷尔纳克 2001：422）¹。但是小说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的天才在于，他往往靠一种**直觉**来诊断，这种直觉性为信赖理性的，在现代医学教育制度下出来的专家们所不能接受，即必然视为**异端**的。日瓦戈医生以后的遭遇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行医对日瓦戈医生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医生这个职业在**精神**上对他意味着什么。尤里·日瓦戈在成为医学院的学生后，“面对被解剖的对象，他体会到从那些直挺挺的尸体的不可知的命运直到盘踞在这里的生与死的奥秘，到处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这里就是奥秘之家，它的大本营。”（76）当然现代诊所的医生已经不再像他们

的祖师，身上有一种浓厚的巫师的性质，对这个世界的神秘有一种冥想。大多数现代医生在手术台上看到的只是一堆肌肉和骨骼，行医只不过是他们生存的一个手段。而日瓦戈医生不同，医生职业却直接带给他神秘感受。他的思想和行为更像一个哲学家，诗人，神秘主义者。在童年时期他就显露出喜好沉思冥想的的天性，在他的舅舅，新基督教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韦杰尼亚平的影响下，他的天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小说中很少见到对他的行医生涯的描述，我们更多见到的是他的思想探求。他的出场大都与思想事件有关。他是一个替别人治病的医生，用手术刀解剖别人是他的职业，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时时刻刻在解剖自己，解剖社会，解剖国家。甚至可以说，他是国家的医生，社会的医生，人的思想的医生。或许小说的题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俄罗斯学者科济佐娃指出，Живаго 在这里既可以是第二格，也可以看作是第三格。可以理解为“生活的医生”。她还进一步指出著名语言学家达里所说的方言意义：не спать, бороться, не спящий, бдящий。她据此认为，这医生是医治那些无法入睡的人们的。（А. Газизова 1990：115）

或许，医生这个职业与哲学家之间本来就有一种内在的联系，米歇尔·福柯在那本著名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指出，临床医学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经验主义的复活，它本身是具体实际的生命，是分析方法的首次运用。尽管它与体系和理论相对立，但是它**承认自己与哲学的直接血缘关系**。为什么要把医生的科学与哲学家的科学分割开来？为什么要把具有相同起源和相同目标的两种研究区分开来？**临床医学通过把语法结构与或然性结构引进病理领域而成为哲学上“可见的”场域**。（米歇尔·福柯 2002：116）很多医生出身的作家都以思想锐利而著名，比如鲁迅，比如契诃夫。这里的医生，不仅治人身体上的病症，还救治人的灵魂。苏格拉底就认为，智者（哲学家）的撒谎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药物”，哲学家就是国家的医生。柏拉图在《理想国》说：“国家的统治者（他指的是‘哲学王’），为了国家的利益，有理由用谎言来应付敌人，甚至应付公民。其余的人一概不许和它（指谎言）发生关系。如果一般人对统治者说谎，我们以为这就像一个病人对医生说谎。”（柏拉图 1986：127）笔者注意到，在描述日瓦戈医生行医的时候，他给人的感觉往往并不像医生，而是像一个预言家，在他的话语中，我们更多感受到的不仅是医生的科学，而更多是哲学家的科学。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在他的丈母娘安娜·伊万诺夫娜得了肺炎，觉得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尤里·日瓦戈的治疗简直就是一篇论述生与死，以及复活的哲学论文。有趣的是，在他治疗结束后，他把手放到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头上，过了几分钟安娜·伊万诺夫娜就睡着了。这简直就是古代医生对病人实施催眠术。尤里·日瓦戈自己也想，“我简直成了个江湖术士，嘴里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把手放在病人头上治病。”

这样的奇迹，这样看起来**超越自然规律，超越必然性的偶然性事件**以后还会不断地发生。比如在红军游击队里，他去给“发疯的”帕雷赫治病，我们看不到尤里对于帕雷赫的病状描述，他跟帕雷赫的交谈并不是医生与病人的交往方式，帕雷赫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明显的症状，这种写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大异其趣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写医生，一定会使用医生的大量术语，以接近细节上的真实，比如契诃夫笔下的医生，就很职业化，显得训练有素。而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这种对职业真实的追求。帕斯捷尔纳克描写的主要对象是人的精神。甚至可以说，小说很少从**外部**去描写人。另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医生认识世界的参照，小说中还安排了**巫医**。这种安排更加能对照出日瓦戈医生与这个“偶然性”的世界的联系。明显的例子是尤里在游击队行医时出现的“士兵的妻子”库帕里哈。小说中库帕里哈并没有被写成一个“反面”的角色。

表面上看起来，诗人这个职业是医生的副业。但是笔者认为，日瓦戈医生实质上是一个诗人，这才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

日瓦戈医生不是为了要去做诗人而写诗，写诗是他体验这个世界的需要。他本质上就

是一个诗人。还在中学时期，他就幻想过写散文，写一本传记体的书，书中就像埋藏炸药似的把他所见到的并经过反思的事情当中感触最深的东西加进去。但写这本书他还嫌过于年轻，于是使用诗来代替，犹如画家一生都在为一幅深思熟虑的巨作勾勒草图一样。（76）他之所以这样说，正是因为他是个真正的诗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人被抛入在诸神与人类之间，坚守在漫漫的虚无黑夜之中，见证着人与大地的关系。（海德格尔 2003:52）

写诗的目的正是为了见证人与大地的关系。尤里·日瓦戈的一生都在写这样的诗，他写道：

Для этого весною ранней
Со мною сходятся друзья
И наши вечера –прощанья.
Пирушки наши-завещанья
Чтоб тайная струя страданья
Согрела холод бытия

这首诗节选自日瓦戈医生诗集的第 21 首，题目叫做《大地》。我们认为，大地见证的正是人的苦难。而苦难，正是人通往救赎的一条途径。诗人的写作，为的是“**让苦难的潜流去温暖生活的冷酷**”。此中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救赎意识，一种对苦难的崇敬，这是因为苦难的、然而又是孱弱的爱，正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正是启示我们，爱的实现必然是与受苦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日瓦戈医生，就是这场苦难的见证人。而这与上帝的**救恩行动**紧密相连。这种对福音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瓦戈医生的形象表达出来的。

天主教士托马斯·莫顿在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说：“您这部分是一个世界，天堂与地狱，神秘性的人物尤里与拉拉如同亚当和夏娃，他们穿行在只有天主才知道的黑暗当中。他们所踏行的土地因他们而变得圣洁。这是俄罗斯神圣的大地，大地上有令人神往的命运，它是神秘的、隐蔽的，藏在神的思维当中。”莫顿所引用的是小说原文。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瓦戈医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尽管神秘主义有很多的定义，但是一般都认为，神秘主义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术语，它多半指一种体验，其核心内容是对上帝的直接认识，对神的临在的直接感受。Mysticism 这个词翻译成“神秘主义”或许并不合适，因为汉语中“神秘”这个字往往使人联想起“迷信”一类的负面的意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指出的那样，概念对于神秘体验而言是致命的，对一切精神体验而言是致命的。（别尔嘉耶夫 2002：139）在精神体验里面没有任何一元论的东西。而“主义”一词，显得是被加工过的概念。然而神秘主义毕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词，它的一般意思，可以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 7 对于“神秘主义”的定义：“神秘主义的目标是与神融为一体；神秘主义修行通常分 4 个阶段进行，即涤欲、洁志、彻悟和神人交融。神秘主义修行就是返回人的本原，防止神人进一步相疏。神秘主义认为，人为了在纷纭混乱的世界寻求平衡，极其需要发现人格中的非物质内容……神秘主义就是过有深度的生活……神秘主义是熔修行与密传知识为一体的一门学科，是上升到最高水平的个人宗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 7：152）而《大美百科全书》（卷 19），将神秘主义定义为“神秘主义是一种对宇宙本体的直接领悟的经验。”这两部权威的百科全书的解释无不强调神秘主义是一种有深度的个人体悟。权威的神秘主义研究家，鲁弗斯·琼斯博士在他的杰作《神秘主义研究》中甚至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我用这个词指一种宗教，它注重直接感受与上帝的关系和切近体察上帝之在场。它是处于最敏锐、最热烈和最生气勃勃的宗教。”（库恩 1999：4）就这种意义，即通过个人的深度体悟来接近上帝而言，日瓦戈医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并非一个传统教会意义上的基督徒。就某种意义而言，神秘主义意味着去跨越鸿沟。就一种古典意义来说，宗教在上帝，也就是无限和超越的存在，和作为

有限的造物的人之间划出了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从而在基督教这种伟大的一神论宗教中发现了这种二元性，而神秘主义正是要跨越这道鸿沟，当然，神秘主义者并不否认或忽视这道鸿沟，相反，它以对这道鸿沟的认识为开端，从这里出发，从而寻求缩短鸿沟的秘密或者可以跨越鸿沟的道路。实际上，这是一种对被宗教摧毁的旧有的统一性的恢复，这具有一种擦抹边界的意义。

小说的文本具有一种福音书的叙事风格。尤里·日瓦戈的形象在很大的程度上让人联想起耶稣。埃米尔·路德维希说，耶稣生来性情温和，富于想象，在本质上他是一个诗人，一个带来欢乐与安慰的教师，一个慈悲的医生。（埃米尔·路德维希 2001：58）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概括尤里·日瓦戈。童年时他就是个好冥想的孩子，好像当年的牧羊少年耶稣，躺在青青草地上，仰望神秘的蔚蓝的苍穹。比起教堂，大自然更加让他觉得亲近。小日瓦戈还常常出现“幻听”。少年耶稣也是如此。同耶稣一样，日瓦戈医生也有时会突然说出一些有启示意味的话。耶稣似乎注定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甚少有人，包括他自己的门徒，能够真正理解他。在客西马尼园里看到自己的弟子，包括他最喜欢的约翰在内，都在呼呼大睡，他也会大喊：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尤里·日瓦戈在他的时代，也常常是一个显得很不合群的人。在结局的一章，在“苏联历史上最难以捉摸和最虚假的时期之一”（537），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出现好像是个“民间传说中探索真理的人”，旁边跟着的瓦夏则好像是个“愚忠的信徒”。这仿佛耶稣和他的门徒的关系，这也正像耶稣的弟子其实并不理解耶稣一样。瓦夏最终离开了日瓦戈医生，因为他只愿意相信一些**显而易见的真理**，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基督在大多数时候都像一个诗人，他似乎有一双真正诗人的敏锐的眼睛。在他的眼中，飞禽走兽、花花草草都是有着自己的丰富的生命，有着自己的意义。而日瓦戈医生，如我们所分析，正是用一个真正诗人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他理解自然界，似乎还能与自然界对话，掌握了某种“通灵术”。

神秘主义可以说是一切宗教的**内在**特征。所谓的**世俗化**运动就是想摆脱宗教的神秘主义成分。在基督教3大教派中，东正教思想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保存最为完好，东正教教会神学的一大特征就是神秘主义。新教神学已经理性化、世俗化了，把神秘主义淡化了，因此，新教神学与世俗哲学越来越接近。天主教神学用教皇的权威消除了宗教自身的神秘主义色彩。而俄罗斯东正教的神秘主义经验的构成与西方是有所不同的。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所言，这是由东正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对基督的态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对于天主教而言，基督是一个客体，一个“他者”，他在人的心灵之外，是人永远追求的对象，爱和模仿的对象，是人向上帝的靠近，在西方的基督教神秘主义中十分强调一个“飞升”的状态，可以说它的类型是哥特式的，西方的教堂是一个个哥特式的尖顶，那象征着通往天堂之路。而东正教的教堂都是圆顶的，在东正教中，基督是主体，它存在于人的心中。人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接受基督。这种态度具有内在的精神性，一切都朝向与上帝的内在交往，在东正教神秘主义经验中有某种对外在世界的缄默和不可体现性。然而这种神秘主义经验也有种种复杂现象，我们看到，日瓦戈医生的神秘主义更为自由，他不接近任何一个神秘主义团体，他的活动中也没有类似于其他神秘主义者的传授的方式，不像彼埃尔·别祖霍夫那样，对于神智学的态度也很明显，我们只要看看小说中对舒拉·施莱辛格的描写就知道了。

在东正教里，神秘主义除了表现在其神学里外，还表现在东正教的礼拜仪式里，比如对礼拜仪式各环节的含意的解释等，都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小说中的舒拉·施莱辛格是对此很熟悉，很热衷的人，她熟悉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小说中对舒拉在教堂里的描写有一种讽刺的态度：“舒拉·施莱辛格是神智学者，对东正教的一整套仪式，包括心灵传递在内，都非常清楚，所以她在兴致非常高的时候，总是按捺不住地要提醒神职人员要说什么，该唱什么，不断让人听到他那声音嘶哑，脱口而出的提示”（64），达到了一种滑稽模仿的效果。因为日瓦戈医生的神秘主义不是这种**合乎教规**的类型。

他的这种开放式的思想同样表现在对民间神秘主义的态度上。我们提到过，日瓦戈医生对于民间的种种神秘主义的现象并不排斥。我们知道，库帕里哈是一个疯疯癫癫、神神鬼鬼的女人，顺势疗法巫医，但是身为医生的尤里并没有以一个理性的框架看待它。他为这个女巫唱的俄罗斯民歌而惊讶。女巫讲的故事让他联想到拉拉。女厨师乌斯季尼亚的民间神秘主义特征更为明显。但是日瓦戈医生也不对这种民间神秘主义抱赞同的态度。这种神秘主义包含着很大的魔法的成分，而魔法并不是自由的。魔法处在**因果关系与决定论**的统治之下，而神秘主义是精神，精神是不受魔法统治的。精神是自由，这与通灵术一类的魔法是刚好相反的。

2 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怨恨与自杀

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是“童话中着魔的人物”。在小说中他的出场不多，但是他每次出场都占有很重的分量。他给人以“神出鬼没”的感觉，经常像从天而降的暴风雪一样出现。（294）他曾是一个历史主义的信徒，是日瓦戈医生的很好的对照。

与“性格软弱”的日瓦戈医生相比，斯特列利尼科夫果断、严酷，讲原则，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他身上，原则、规则、纪律这些决定论的因素使他的思想只接受“**必然**”的概念。他“缺少应付**偶然**情况的思考力”，“不善于利用**意料之外**的新发现去改变不会有结果的原来的完整设想”，“他的原则性还缺少内在的非原则性”。（295）他的名字与规则、准确、必然联系在一起。斯特列利尼科夫自杀，与“必然性”大有关系。

斯特列利尼科夫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这个家庭给了他名字巴威尔。他的父亲，老安季波夫，是一个老革命者。在这样的出身背景下，巴威尔成为一个革命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促使他成为革命者的并不是他的出身。父亲在他的生活中出现的时间很少，可以说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的母亲是一个不可能对他进行革命教育的家庭妇女。在小时候他就显出于他的出身不相称的特点。他似乎更喜欢一种干净、稳定、**有规律**的布尔乔亚的生活。他“作为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却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习惯于首都生活的城里人”。（123）他博闻强记，性格温顺，是一个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他似乎应该过一种安逸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可为什么要到军队里去？用“阶级感情”来解释，显然是说不通的。小说文本告诉我们，因为他怀疑自己与拉拉的爱情。他不理解拉拉的爱感。他爱拉拉，可是他以为拉拉对他只有宽容的、母亲对孩子的爱。在小说当中，相当长的一段内容我们看不到巴威尔·安季波夫，接着就是他奇迹般地成了斯特列利尼科夫。看上去，他们之间的反差很大，根本就是两个人，这两个形象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大众眼中的优秀教师巴沙·安季波夫是如何就“成长”为犬儒主义的革命者，无情的“枪决专家”斯特列利尼科夫的？

实际上，他的这种转变是从结婚的那天晚上开始的。

一个纯洁的，像一只“初生的牛犊”一样纯洁的男孩子，发现自己心目中的纯洁的女神，自己的新娘，竟然是一个**堕落**过的女人，作过一个年龄足以作他父亲的人的情妇，他自然有很深的情感伤痛，“他的心一次比一次更往下沉，仿佛跌入万丈深渊。他那遍体鳞伤的想象力已经跟不上她所吐露的新情况了”。（113）他这时产生了恨（此前他并没有这种强烈的情感，甚至对他父亲的流放他也显得很淡漠），这就是对那个诱奸者的痛恨，他侮辱了自己的新娘，也就是侮辱了自己，让他失去了男人的尊严。他的仇恨在伦理层次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谁说他的这种痛恨更多的不是由于他的男性的尊严的受辱带来的感情上的耻辱感呢？要不然，为什么他不去安慰、拥抱这个受伤的女人，不去好好爱她，而是把她给扔下，让她“最光明、最美好的希望破灭”？（127）

退一步来说，就算是为了拉拉吧。

他上大学是为了她，当教师也是为了她，去打仗，为的是“三年后重新占有她的心”。

投身革命，“以便为她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彻底报仇，洗清那些悲伤的回忆。以便过去永远不再返回，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不再存在。”（533）他的目的如今已经很清楚了，是为了复仇。所谓的为了拉拉，其实只不过是为自己，为了自己以一种强大的男性的形象，“重新占有她的心”，却不知道，她在以一种超出一般女人能给与的爱情爱着他。而他对这种真正的爱感却不能够真正的领会。他对拉拉的爱确切地说，就是对自己的爱，对自己的自尊的爱。

假如我们来翻看斯特列利尼科夫所走的每一步，就会发现他有一个很明确的原因去做他所做的一切：为了怨恨。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小说中斯特列利尼科夫有一个“非党枪决专家”的身份。这一点意味深长。他不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人，按照拉拉的话说，他是唯一一个“真诚到顶点”的人，是“纯洁的体现”。（486）他的非党身份是因为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着坚定的信仰。他也很明白，别人是在利用他，但是何尝不可说，他也同是在利用一种理论，一种元叙事，来达到他复仇的正义呢？

他的这种怨恨一开始是一种掺杂着嫉妒的报复心理。可是这种报复在当时不能立即做出回击。毕竟，他无法对科马罗夫斯基立即实现报复。那么，他这种因为没有能力反应，会形成一种隐忍受伤以伺机报复的情感。这种情感在积聚的一段时间内，就会由报复、恼恨、嫉妒、厌恶而上升为怨恨。可以说，斯特列利尼科夫为了自己的耻辱隐忍了很长的时间，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即，找到了**合法化理论依据**以及发泄对象的时候，这种怨恨就能够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那么，究竟什么是怨恨？马克斯·舍勒将此界定为：怨恨是一种有明确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为强行抑制某种感情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心态；这种强行抑制的隐忍力通过系统训练而养成。当然，这样的描述更多的是带有评论者的态度，而不是对象的形态及实质结构。作为现象学家，舍勒还从现象学的角度和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怨恨。那么，怨恨和报复、嫉恨这些心态有什么区别呢？从形式上来说，后者存在一种特定意义的否定方式的特定对象，一般与某种特定诱因联系在一起。随着这种诱因的消失，特定对象也会消失。而怨恨则不一样。它并不随特定的诱因的消失而消失。就生存本体论而言，怨恨包括了生存性的伤害、生存性的隐忍、生存性的无能感。问题在于，**当个体或群体把受到伤害感受为自己的此在和所在受到伤害时，报复感就很容易转化为怨恨心态。**（刘小枫 1998：361）

我们看到在《日瓦戈医生》中，斯特列利尼科夫把一种个人感情的伦理转换成了一种公众意志的伦理。他个人的，为着男性自尊受辱而进行的复仇行为变成了一种公众伦理所赞赏的高尚行为。他的私人的痛苦在这里似乎得到了许可，可以用不计其数的他人的眼泪来医治，而且有着多么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为了正当性。“一种少年的、毫无根据的自尊心促使他对生活当中谁也不会见怪的事恼火了。他开始对事件的进程恼火，对历史恼火。”他的恼火使他参加了战争。

为了这个正当性，他克制住了自己见妻子的欲望，为的是把事业进行到底。“他长久地把**屈辱**埋藏在内心深处，后来就开始喜欢让自己的想法有朝一日能在生活与败坏了的生活的种种恶势力之间充当仲裁，目的在于捍卫生活并为它进行报复。”（295）在这时候，他怨恨的对象已经成为“恶势力”，即一群人了。而他由于已经掌握了这个正当性（这是他参加俄国革命的结果），因此获得了审判别人的权利：他可以利用，甚至滥用这个审判权，洗清自己身上的屈辱。这也使他成为拉拉所说的“出轨的列车”。

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舍勒认为，当个体或群体的身份和社会角色认同与其在社会既定秩序（法律的、经济的、或是文化理念的）中的定位不相符合，并由此产生社会性生存比较时，就容易产生怨恨心态。简言之，“我有资格成为你那样的人，却没有成为那样的人”。

这样容易形成一种政治身份的不平等，也很容易激发起怨恨，一个例子是小说中的女战士赫里斯京娜。父亲（一个神职人员）的被捕使她认为这是她一生的污点。她也许在自己炽热的童心里发誓，一定要洗掉自己慈父名字上的这个污点。为了这个污点被洗清，实质上是为了让自己在别人眼中显得纯洁，不，是**必须**比其他任何人都要纯洁，这种情况下她会比任何“出身清白”的孩子更狂热、更积极，也更容易采取极端的行动。然而斯特列利尼科夫不一样，他出身工人阶级，他不会有这样的激动，但是他参加革命的目的也是由于怨恨，只是并不像赫里斯京娜一样，是一种强烈的政治诉求。他有一种强烈的情感诉求，为了自己的这种私人的感情的需要，他投向了一种可以让他的这种诉求实现的**公共伦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动机中，都有“**洗清**”这样的一种愿望，要**洗清**，是因为他们觉得以前有某种肮脏的东西，给他们带来屈辱的东西。可是，他毕竟不是赫里斯京娜这样的小姑娘。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就是因为这思考，他看到在自己的前面是一个深渊：精神分裂。

为了拉拉所蒙受的耻辱，其中当然主要是他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对那些“花花公子”的痛恨，他看起来理所当然也要去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然而在历史理性的公共伦理面前，却有一种痛苦在折磨着他。这看来似乎是很奇怪的。他说，“我们把生活当成战役，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移山倒海，尽管除了痛苦之外我们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我们丝毫没有欺负过他们，因为我们要比他们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531）在这时，他已经将要走向精神分裂。

为什么斯特列利尼科夫要这么说？他们的“更多的痛苦与折磨”何在？

斯特列利尼科夫忏悔：

“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认为一切都是狂热的、畸形的、荒诞的歪曲。”他同医生的谈话中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以免陷入孤独，“他惧怕良心的谴责还是惧怕追逐他的悲伤的回忆，还是对自己的不满在折磨着他？他对自己的不满已经到了无法忍耐、仇恨自己、羞愧得准备自杀的地步了。”（528）

羞愧，是因为“负罪”，觉得自己是“骗子”、“叛徒”。关于这种“自我谴责”，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一书中，用他的方式做出了分析。他用一种尼采式的语言说：“我把良心谴责看作一种痼疾，人们罹患了这种痼疾是由于那个史无前例的深刻变迁给他们造成了压力，这种变迁将人永远地锁入了社会的和太平的图圈……所有不允许发泄的本能转而内向，我称其为人的内向化，由于有了这种内向化，在人的身上才生长出了后来被人称之为‘灵魂’的那种东西。……那个被国家组织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古老的自由本能侵害的可怕的屏障（惩罚是这个屏障中最主要的部分），使得野蛮的、自由的、漫游着的人的所有本能都转而反对人自己。仇恨、残暴、迫害欲、突袭欲、猎奇欲、破坏欲，所有这一切都反过来对准这些本能的拥有者自己，这就是自我谴责的起源……良心谴责引发了最严重、最可怕的疾病，人类至今尚未摆脱这种疾病：人为了人而受苦，为了自身而受苦……”（尼采 1992：63）尼采的分析自有其深刻之处，尤其是他指出自我谴责是人起来反对人自身。然而他认为，基督教上帝的面世因此也就使得世界上出现了负疚感之最。他是站在基督教的对立的立场上的，但是他不考虑，拆解了神性的人必将无所依附，在虚无的深渊中一步步走向崩溃，尼采本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羞愧感从何而来？是因为面对现世的恶。也就是人的恶。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民族，罪感是与生俱来的。俄罗斯更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救赎传统的民族，如斯特列利尼科夫所说，俄国革命是“突然为人类的一切无所事事和苦难燃起赎罪的蜡烛”。救赎，包含着拯救与赎罪，上帝将自己降身为罪人，通过圣子的受难而完成了救恩的行动。人通过上帝的行为领悟到自己有一个神性的本源。这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根基**。因为这种反叛，人失去

了精神的故乡，生命因此无所依附，破碎了，斯特列利尼科夫看到了现世的恶，而且他的行动和事业并没有使他所爱的人摆脱这种恶，所以他说，“除了痛苦之外我们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这时候，要么他来承认现世的恶具有的绝对力量，跪拜在其面前，要么就来承担，那样他必然会**分裂**，这种未可知的痛苦使他选择了自杀。

我们自己共同参与的拆毁神性的罪恶，使得某种道义的基础彻底破产。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一言以蔽之，每个人都是“叛徒”。“叛徒”这个词很有意思，实质上意味着对自己确信的信仰的背叛。史铁生说得好，如果他确实相信自己错了，并因此倒戈叛变，那倒也不会自杀，因为这只是改变信仰。如果是真的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例如金钱、美女的诱惑，则更加谈不上自杀，这意味着以前就没有过什么信仰。可是，如果对原来的信仰就没有什么怀疑，而是由于实际上的利益，比如自己会不会因此死去，但是可免一死，这样的背弃信仰才是“叛徒”。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说，真正严峻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是否能自杀。断定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等于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用他的手枪自杀了。他说：“妈妈，我的姐妹们，请原谅我，人当然不应该这样做（我不劝别人这样做），但我没有出路。”

“没有出路”的原因是信仰的破灭，如同帕斯捷尔纳克在《人与事》中所说的，法捷耶夫带着他那内疚的微笑，从种种政治诡谲中走了过来，在开枪的最后一刹那，又带着这种微笑，与自己告别。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斯特列利尼科夫与马雅可夫斯基或法捷耶夫在表面上的惊人相似之处。为了历史的目的，“神圣的事业”，他们将历史理性主义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那时他们只有这样做，因为这是他们的信念，因为他们用这种信念换置了神性的精神根基。然而有一天，他们的这种信念动摇了，他们怀疑，历史中的国家真的就代表了正义与完善？是否具有绝对的意义？它怎么就可以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个性之上呢？他们从某个角度看到了虚无。终于，斯特列利尼科夫说出了这样的话：“整个19世纪和它在巴黎的所有革命，从赫尔岑算起的几代俄国侨民，所有见诸行动或不见诸行动的企图谋杀沙皇的人，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运动，欧洲议会和大学里的全部的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的新体系，新奇而迅速的推论和嘲弄，一切为怜悯而制定出来的辅助性残酷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被列宁所吸收并概括地表现出来，以便对过去进行报复，为了过去的一切罪恶向陈旧的东西袭击。”

但是，在这段话里我们要看到斯特列利尼科夫与马雅可夫斯基或是法捷耶夫的“动因”的不同之处。马雅可夫斯基将十月革命理所当然地看作是“我的革命”，他在自传中说，对于莫斯科的未来主义者来说，参不参加革命？这种问题是没的。（马雅可夫斯基1982：21）他是一个诗人，对于他来说，参加革命就像写未来主义的诗歌一样。他的创造力，他的全部诗情与“革命”这个词是密切相关。但是，又如同帕斯捷尔纳克在《安全护照》中所说的，他在革命中的位置—外在的是如此合情合理而内在的又是如此牵强和空虚。（帕斯捷尔纳克1994：140）

从《日瓦戈医生》的小说文本看来，如果说巴沙·安季波夫参加革命也有着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内在的原因是显然令人生疑的。在本性上他并不具有那种诗人的内在驱动。他说的这段话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由于“报复”才投身革命的。就如同上文阐释的那样，因为怨恨他才成为了斯特列利尼科夫。我们多次通过日瓦戈医生的视角知道，斯特列利尼科夫这个名字就是明确的概念，直率的态度，严厉的原则。他坚信为了历史的必然规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罗伯斯庇尔，革命的恐怖、道德的法庭、人民的公共伦理的推

行者，后来的精神病人说过这么一段精辟的话：“圣子耶稣用自己的血解救世人，我却要世人自己流血解救自己。圣子从痛苦中尝受欢乐，我要尝受的是刽子手的痛苦。我和他比起来，谁比我的牺牲精神更大？……真的，圣子耶稣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上一个十字架，我们所有的人却在客西马尼园里撕打得头破血流，可是谁也不能用自己的创伤解救别人。……到处是荒凉、空虚，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刘小枫 1998：21）他的痛苦与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痛苦何其相似。显然他明白恐怖所带来的毁灭的力量，但是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体验到的荒凉和空虚，孤立无援。他自负地把自己和耶稣作比较，因为他原以为按照自己的设想可以解救世界。正像斯特列利尼科夫告诉日瓦戈医生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恶**，他们所做是为了消灭罪恶的根源。拉拉的形象，一个带有向旧时代控诉的特征的形象让他采取行动，他不无自豪地问日瓦戈医生，您为此做了什么？日瓦戈的回答是，**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日瓦戈医生的这个回答意味深长。这也等于告诉他，他们是**两类人**，他与拉拉之间的事情，是他所不能懂得的。

终于斯特列利尼科夫走到了一种漫漫黑夜中的虚无。这是他无数的前辈走过的，在那些人当中，有拉斯科尔尼科夫，有马雅科夫斯基，只是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我们看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牺牲的救赎。既然已经走向虚无，当然所有的信念都会化为泡沫，更为重要的是，要以荒诞为自己的信念，他需要一颗**石头心**。于是，斯特列利尼科夫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杀，要么成为半人半兽。人可以接受荒诞，但是人不可以生活在荒诞中。既然他认为自己除了痛苦外没有给他想象中的所爱的人们带来任何东西，既然他不想像丹东一样，被罗伯斯庇尔们以**历史**和**人民**的名义送上绞刑架，他只有自杀。

帕斯捷尔纳克在《人与事》中说，“一个人受尽刽子手的摧残，还不等于他已经被消灭。他由于痛苦而狂乱时，他还存在于自己的末日，他的过去还属于他，他还能够回忆往事，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利用回忆，回忆能在死神面前助他一臂之力。

当一个人决定自杀时，就是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布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不能拯救他，也不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也许，不是出于恪守决定，而是由于人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人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而最后结束了生命。”

刘小枫说，回忆是因为遗忘。基督教的回忆是忏悔，因为遗忘是一种罪。这是一种独特的罪感。人忘记了上帝赋予他的神性的本源。所以才会要回到生命的神性的源头。然而对于斯特列利尼科夫来说，这种神性的源头已经遭到了破坏，他看见的只是生命的破碎，虚无的深渊，以及无法承受的恐怖，他不愿再承担这种痛苦。他的信仰破碎了，但是他又不愿意背弃，不愿意做“叛徒”去改变信仰，所以他向自己开了枪。

3 拉莉萨·吉沙尔：“俄罗斯大地”与赎罪

在面对现世的恶的时候，拯救是必须的。在俄国作家那里，女性往往被赋予了强烈的拯救的气息。因此背负苦难，几乎成了俄罗斯文学中“正面”女性的使命。所不同的只是对苦难的意义的理解。有一次拉拉做了一个梦：她被埋在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她左边的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而人们在地上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别让玛莎过小溪》（56）。

对于这个梦，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其中，美国学者，本身具有俄罗斯情结的埃德蒙·威尔逊认为这是作者的“文化恋母情结”的体现。他援引日瓦戈医生在听了女巫的话以后产生的幻觉：“拉拉的左肩被挑开了一点。就像把钥匙插进保险箱的铁锁里一样，利剑转动了一下，劈开了她的肩胛骨。在敞开的灵魂深处漏出了藏在那里的秘密。她所到过的陌生

的城市，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住宅，陌生的辽阔地方，像卷成一团的带子一下子抖开了。”
(428)

威尔逊认为拉拉是俄国文化女神，三个男人为了争夺女神而发生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框架。对于拉拉的梦以及日瓦戈的幻觉的疯癫怪诞的写法是隐喻女神的重生与复活。我国学者赵一凡指出威尔逊自己本身的一段恋情，以某个女性为文化女神的观念对此有很大的影响。这指出了威尔逊的观点的过于主观性。还有的观点更认为拉拉的形象是俄国文学中一种传统的“圣母崇拜”。“他们都以纯洁、善良、无私、奉献、富于牺牲精神，充满母性情怀而著称。作家往往淡化了她们的生命激情、内在冲动，而更多地赋予她们以灵发气息、圣洁的光彩。这些圣母般的女性，往往成了男性生活的引导者，理想归宿。在日瓦戈对拉拉的依恋中，便包含了寻求生命价值、精神归宿的渴望。……对于日瓦戈来说，拉拉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情侣，又是他的精神之母。同时，从整个文化、道德的角度来说，拉拉又成了受尽苦难的俄罗斯圣母的象征。”（转引自包国红 2001：196）

作者还把拉拉的形象与普希金的达吉娅娜、屠格涅夫的丽莎、叶琳娜、达尼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索尼娅、托尔斯泰的吉提相提并论。然而我们认为，在这一系列女性形象中，除了索尼娅的形象稍微接近之外，其他人的形象都与拉拉相去甚远。尤其是在关于“圣洁”的意义方面。

在拉拉的梦的意象中，关于大地的隐喻是显而易见的。从乳房里长出草，人们踏在上面唱民歌，这都是直接的关于母亲与民族的隐喻。对于这一点，帕斯捷尔纳克不吝笔墨：“俄罗斯——他的无可比拟的、名扬四海的、著名的母亲，殉难者，顽固女人，癫狂女人，这个女人精神失常又被人盲目溺爱，身上带着永远无法预见的壮丽与怪癖！……多么想对生活本身，对生存本身说声谢谢……而这正是拉拉。”（453）他与拉拉的生活中，因此对上帝谢恩，这仍然是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

“主啊，主啊！”他想低声叫出来。“而这一切都属于我！为什么赏赐我的这么多？你怎么会允许我接近你，怎么会允许我误入你的无限珍贵的土地，在你的星光的照耀下，匍匐在这位轻率的、顺从的、薄命的和无比珍贵的女人的脚下？”（506）

而斯特列利尼科夫同样也把拉拉看作是俄罗斯民族的化身：“她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呢，但在她脸上、眼睛里，已经能够看到警觉的神色，世纪的惊恐，时代的所有主题，它的任何觉醒和它所积蓄的全部仇恨与骄傲，都刻画在她的脸上与她的姿态上，刻画在她那少女的羞涩和大胆的体态的混合上。可以用她的名字，用她的嘴对时代提出控诉。……这是某种命运，这是某种标志。”（532）

拉拉本人对于土地更是有一种自觉的认同感。在通往林中的小径上，她领悟到，“她活在世上为的是解开大地非凡的美妙之谜，并叫出所有的事物的名称来，如果她力不胜任，那就凭借这对生活的热爱养育后代，让他们替她完成这项事业。”（88）拉拉总是“眷恋着土地和普通老百姓”。（123）

很容易把大地、母亲与人民这些概念联系起来。母亲，容易让人想到一个拥抱的姿态，一个哺育的姿势，这与辽阔的大地非常相似。生育，更是女性与大地相同特性。尤其是对于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民族。俄罗斯大地是女性的，同时是深沉的，日瓦戈医生在梦中听到一个有着“浑厚、低沉和圆润嗓音”的女性的召唤，他一时不知道这是谁，（335）在亲自见证了民族的苦难后，他终于回想起这个浑厚、低沉的声音，这正是拉拉，正是深沉的俄罗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说，在俄罗斯民族，与土地相联系的宗教是有强大势力的，它深深扎根于俄罗斯农奴阶层。土地——这是他们的最终庇护者。母性——这是最基本的范畴。圣母排在“三位一体”之前，在地位上则几乎与“三位一体”等同。人民深深感到圣母——女保护

人比耶稣更为亲近。耶稣很少以尘世的方式表露自己。只有母亲——土地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别尔嘉耶夫 1995：6）日瓦戈医生对大地、母亲有着很深的俄罗斯式的情感，他在瓦雷金诺的劳动日记中写道：“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随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328）对于母亲，他更有一种崇拜，他认为“每一次的受孕都是贞洁的”。拉拉的形象同样与大地母亲的原型意象相关，可是，她的形象与传统的圣母意味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这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特别的突出了其尘世的意义。在拉拉的身上，圣母的形象是与普通的凡人的形象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不是那种在**公众道德**意义上完美无暇的凡人。

作为“大地”与“母亲”的结合，拉拉的形象是与“殉难”、“被践踏”密不可分的。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拉拉是一个受践踏者、赎罪者，在这种意义上，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索尼娅有相似之处。我们认为，拉拉的形象正是俄罗斯大地母亲的象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日瓦戈医生和斯特列利尼科夫都直接感觉到拉拉身上的母性，以及给自己的爱犹如一种母亲的爱，所不同的是，斯特列利尼科夫不理解这种爱。

我们来关注拉拉的梦的那段隐喻。拉拉的梦所发生的时间是她在做了科马洛夫斯基实质上的情妇，她自己接受了这个现实以后，这样的安排并不是漫不经心的，接下来小说就说到拉拉去教堂，拉拉与日瓦戈医生一样，并不信奉宗教，尤其是宗教的仪式，教堂长老的声音在她听来“就像那扇窗户和窗外的小巷一样扁平”。但是她在内心深处则有对上帝的无限崇敬。小说中写到她的“内在音乐的陪伴”，“它是上帝关于生命的箴言”。这个时候正是拉拉心灵空虚，漫无目的的时刻。听到经文，她打了个冷战：“受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他们关于自己有许多话可以诉说，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这是基督的意思”。（58）

这里明显流露出典型的俄罗斯式的对**受难**的崇敬。我们无须讳言的一点是，拉拉在这个时候堕落。当然，她是被诱骗的，但这仍然是**精神**上的堕落，有的研究者往往在这一点上避重就轻，其实这对阐释拉拉的形象来说非常重要。固然，她与科马洛夫斯基的性关系是让她感到羞耻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在这种关系中，姑娘自己也感到**惬意**。（55）但是这也就意味着**精神**上的受难。在斯拉夫语系里，**情欲**这个词首先表示痛苦，上帝的情欲意味着上帝自愿受苦。在这一点上，拉拉的形象比《罪与罚》中索尼娅的形象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帕斯捷尔纳克根本就没有把拉拉写成一个在**道德**上无可指摘，**无辜**的、引人同情的人物。索尼娅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一种赎罪的纯洁的羔羊，人的气息并不是很明显，而拉拉的形象与**常人**，与生活中的人更为接近，我们注意到，日瓦戈医生在看到卷起袖子来劳动的拉拉时，感到非常震惊，这种强健的美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他为此感到非常着迷。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的拉拉是**劳作**中的状态，这种状态更吸引日瓦戈，我们分析过关于劳作对于日瓦戈医生的意义。他对拉拉的爱情是一步一步加深的。她的忏悔，更带有自己的罪，小说中日瓦戈医生的精神教父，自愿还俗（理解他为什么自愿还俗非常重要）的神甫韦杰尼亚平说，基督来到人间，故意显出乡土气息。笔者认为，这特别突出了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对于耶稣基督的理解，这种理解未必符合神学院的观点。这样做更是为了基督精神的**普世**意义，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发现神性，就像韦杰尼亚平所言：“这个加利利人来到这俗气的大理石和黄金堆中，从此，一切的民族和神不复存在，开始了人的时代，做木工的人，当农夫的人，夕阳晚照之下放牧羊群的人。人这个音听起来没有丝毫傲气，她随着母亲们的摇篮曲和世界上所有的画廊崇高地向各地传播。”（50）用“民间的”西玛的话来说（这话正是对拉拉说的），“**上帝变成人，以便把人变成上帝**”（478）。理解这层意思对于理解拉拉形象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拉拉的堕落是人的堕落，因为这种堕落，这种对罪的认识，拉拉的形象才更加生动。日瓦戈医生说：“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来没有向她们展现过美”（463）。他对拉拉的爱，从情感上来说是非常复杂的，因为

这种对“被践踏”的崇敬，也有一种嫉妒感，这种嫉妒感不是对于斯特列利尼科夫，而是针对科马洛夫斯基。他断言，“女人的天性是不可理喻的，充满了矛盾，你所厌恶的某个角落也许正是使你比起你所真心地、毫不勉强地爱上的人更愿意屈从他的原因。”(465)日瓦戈医生说妒忌与拉拉有关的神秘的、无意识的东西等等，因为他要了解大地的奥秘。在他对女巫的话的反应中，有一种对谜的破解，就是拉拉让他感到困惑的那些谜，他急于解开这些谜，就是那些**陌生**的街道，**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辽阔地方。而正是在和民间叙事的碰撞中，他解开了这个谜。这个谜是与基督的抛弃神性有着共同之处的。

拉拉作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对俄罗斯大地的隐喻，她有着独特的**罪感**。这种罪感来自于她的内在音乐。跟日瓦戈医生比起来，她的身上似乎有更多的非理性的因素。她的形象同日瓦戈医生一样，并不能在一种客体化世界的意义上被解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理解拉拉比理解日瓦戈需要更多的内在的体验。

表面上看来，拉拉的罪感来自于她个人的私生活。但是正是这种个人的私生活使得她更为接近上帝。小说中西玛（韦杰尼亚平思想的民间阐释者）在与拉拉的交谈中，说到《圣经》中的少女马利亚的受孕。“具有何等重大意义的转变啊！从古代的观点来看是微不足道的人的私生活，何以在上苍看来竟与整个民族的迁移（犹太人过红海）具有同等意义呢？因为要用上苍的眼睛并在上苍面前评价一切，而这一切都是在唯一的圣框中完成的”。(478)

她的这种罪感与“**囚禁**”的意象，与俄罗斯大地紧密相连。她的名字在俄文中是“海鸥”的意思，她的姓氏“吉沙尔”，原意是“监狱中的小窗户”，这个名字显然与“冲破牢笼、向往自由”有关。我们不难在《日瓦戈医生》中发现很多与“**飞翔**”有关的意象。日瓦戈医生在游击队的密林中想到拉拉时，他幻想自己生出了一双翅膀，“在他的肩胛骨下面飞出”，他的个性在这个时刻一下子觉醒了，不断呼唤拉拉的名字。而这正是日瓦戈医生被游击队**囚禁**的时刻。正是因为被囚禁，人才要飞翔，飞出囚笼。囚笼意味着不自由，拉拉在少女时代就被科马洛夫斯基在精神上囚禁。拉拉在日瓦戈医生的棺材旁领悟到这一点，即通过自己心爱的人的死领悟到这一点：

“她身上发生了一种无法完全理解的变化。她想借助他的力量，哪怕时间短暂，也要从**囚禁**中挣脱出来，从痛苦的泥潭中爬到新鲜的空气中，像先前一样体验解脱的幸福。”(575)

拉拉为自己的罪而忏悔，而赎罪，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俄罗斯大地的一个隐喻。斯特列利尼科夫说，俄罗斯为整个人类的苦难燃起赎罪的蜡烛。而这正是20世纪初俄罗斯很多哲学家的观点。小说中表现在拉拉的形象上，是与《圣经》中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密不可分的。

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公众道德**看来，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圣经·路加福音》、《圣经·马太福音》中有关于她的记述。她见证了耶稣的神迹，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第一个见到耶稣的复活。在西玛与拉拉的交谈中，有特别关于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一段文字，关于在复活节的前一天，在耶稣的死与复活的时候提到的马利亚：

“……她向主乞求道：请解脱我的责任，像解开我的头发一样……这里她极为坦率地哀痛过去，哀痛先前每夜根深蒂固的旧习煽起的性欲……她祈求耶稣接受她忏悔的眼泪，倾听她内心的叹息，以便她能用头发擦干他最洁净的脚，天堂中被惊呆和受到羞辱的夏娃便躲藏在她用头发擦脚的声音中。突然，在头发后面迸出一句祈祷词：我的罪孽深重，你的命运何其坎坷，又有谁能查清？上帝和生命之间，上帝和个人之间，上帝和女人之间，多么接近，多么平等！”(480)日瓦戈医生的诗歌之23、24首名为《忏悔的女人》，写的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同时书写的也是拉拉。“教堂的帷幕明天就要落下 / 我们都会被抛到一边 / 大地要在脚下震颤 / 也许为了我的可怜。”“我主耶稣 / 你一旦双膝跪倒 / 我会把木十字拥抱 / 若

是将你埋葬 / 我将无知无觉倒在你身旁。”正是在这个十字架上，拉拉才获得了自由，被解开了头发。她的个体的生命才获得了自由。

在这里我们看到，个人的偶在生命被赋予与上帝平等的高度（但决不是代替上帝）。拉拉的生命，总是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处于一种机遇中的漂浮状态。那些必然性所决定的秩序和规则，对她来说都是无效的。在日瓦戈医生的葬礼上，她“不拘礼节地用生动的日常话向他告别，这些话打破现实的框子……就像合唱和悲剧独白一样……”（576）拉拉和日瓦戈医生一样，不喜欢那些刻板的、属于必然性的东西。同样，她的形象也具有打破疆界，以个体生命的永生达到与上帝同在的意义。

综上所述，帕斯捷尔纳克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他所刻意做出的设置，从主人公日瓦戈医生、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到一些看起来次要的人物如韦杰尼亚平舅舅、西姆什卡、叶夫格拉夫弟弟、桑杰维亚托夫，概莫能外。这些人物形象未必性格鲜明，未必栩栩如生，未必引人入胜，甚至未必令人感动。因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主要目标，都在于让这些人物形象来表达他自己对于 45 年以来的历史，对“福音书”，对历史中人的生命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所隐含的内在意义是，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或历史必然性。每一个生命来自于偶然的机缘，这种机缘代表着上帝的恩典，《日瓦戈医生》中的 3 个主人公，其命运设置甚至到了生硬的地步，帕斯捷尔纳克经常在他们的生命旅途中设置种种突如其来的巧合，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出自己的这种体悟。

附注

1 以下引文出处只标出页码。

参考文献

- [1] Алова А. 1988 Роман летел к расвязке. К истории создания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J], Огонёк. №37.
- [2] Асмус В. Ф. 1990 Творче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 Б. Пастернака [M], М.
- [3] Баевский В. С. 1980 Миф в поэтическом сознании и лирике Пастернака [A] // Изв.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Т. 39 №2. [C], М.
- [4] Белова Т. Н. 1993 Роман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в англоязыч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80-х годов [J], Вестник Моск. Ун-та. Сер. 9. Филология. №6.
- [5] Берковская Е. 1999 Мальчики и девочки -40х годов [J], Знамя. №11.
- [6] Бергнёс Ю. 1994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тема в романе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A] // Евангельский текст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9-20 веков [C],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 [7] Ким юн-ран 1997 Своеобразие сюжета и композиции в романе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ё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филологич. наук [J], МГУ.
- [8] Пастернак Б. 1998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СПб.
- [9] Степун Ф. 1989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M], М.
- [10] Урнов Д. 1990 Безумное превышение своих сил [A] //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С разны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C], М.
- [11] 包国红 2001 风风雨雨“日瓦戈”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 [12] 别尔嘉耶夫·В 1992 俄罗斯思想 [M], 北京: 三联书店.
- [13] 别尔嘉耶夫·В 2001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 [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 [14] 别尔嘉耶夫·В 2001 精神与实在 [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 [15] 海德格尔 2003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6] 利哈乔夫 1989 利哈乔夫院士论<<日瓦戈医生>> [J], 外国文学动态第 1 期。
- [17] 刘小枫 2000 拯救与逍遥 [M], 上海: 三联书店。
- [18] 刘小枫 1998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M], 上海: 三联书店。
- [19] 路德维希·E 2001 人之子——耶稣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 马雅可夫斯基 1982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1] 帕斯捷尔纳克 2001 日瓦戈医生, 桂林: 漓江出版社。
- [22] 帕斯捷尔纳克 1994 人与事 [M], 北京: 三联书店。
- [23] 《圣经》(研用本)
- [24] 叶夫多基莫夫 1999 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25] 张百春 2000 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 [M], 上海: 三联书店。

Three Shadows

Zhang Xiao-do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Doctor Zhivago, written by Boris Pasternak has been followed with interest by most Russian literature researchers all over the world since it was published. Comments on this novel are various and pluralistic. Generally, scholars regard this novel as an "enigma". The writer of the thesis thinks that the "contingency" impenetrated in the whole novel is the key to the "enigma". Pasternak told us his thought on history by the heroes of this novel, especially by Yori Zhivago, Lara and Pasha. They are three shadows of Boris Pasternak.

Key words: , "contingency"; history rationalism; mysticism

收稿日期: 2004-05-12

作者简介: 张晓东 (1975—), 江苏人, 北京师范大学俄语语言文学博士, 现为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以及比较文化的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 刘 锟]